

热

## 历史

## 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但怀爱惜之情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再如“鼋鼍、鱼鳖、鳅鱠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荀子·王制》），强调取用动物应符合其生长节律。这些规定皆保护了动物资源的繁衍生息，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作为汉代施政精神的《盐铁论》指出，“夫一家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饲养一头猪的谷物是一个成年男性半个月的粮食，深刻揭示了畜养动物的成本可以养育更多人，动物食料的成本远高于植物食料。这种近乎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尽可能地避免了植物能量以动物能量的形式集中供给少数人，在古代中国保障了更多人免于饥馑而得以生存。

爱惜动物是“仁心”的发露，为政者以爱惜动物作为施行仁政的姿态，在后世已成中国政治传统。如北魏孝文帝“至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唐文宗下《禁弋猎敕》“保兹怀生，下遂物性”，以至北宋前期在短短几十年中频发包括《禁采捕诏》《禁屠牛诏》《放鹰犬诏》等十道涉及动物保护的诏令。动物生态伦理的政治化，是古代中国生态伦理的重要特征。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

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蚊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对动物痛苦的感同身受，明儒高攀龙曰：“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并在家训中嘱咐，“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为生命算计，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杀一命，于吾心有无限安处。”（《高子遗书》卷十）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易传·系辞上》对这种相感相通的精神超越性作了最高肯定：“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

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害。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神性本身。

现代学界的动物关怀思想，大致有“动物权利说”和“动物福利说”两种。动物权利说主张，动物有其不可替代的固有价值，应平等的考量而不应取用；动物福利说不反对取用动物，但人类有义务使动物避免痛苦并造就其康乐生活。以古代中国对于动物的同情、爱惜和敬畏这三重伦理维度来观照，动物权利说的动机与同情之义相当，动物福利说的动机与爱惜之义相当。目前，源于西方的动物伦理学，始终在不懈地致力于、也局限于这两种意义上的论述，而以敬畏之心对待动物的态度是不见的。敬畏是古代中国独有的动物关怀精神。

（《光明日报》）

生活史

## 陶器与饮水灌溉

水是生命之源，人离不开水，畜离不开水，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因此，原始先民总是临水而居，世界文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大河两岸。

陶器出现之前，人们饮水十分不便。人类最初是与动物一样趴在地上引颈舔池，之后又学会了双手掬水啜饮，或者借助自然的器物如竹子、芦颈、果壳、树叶等顺势就饮。不过，这些饮水方法都得在水源相对丰沛的时节才能行之有效，若遇旱季，或远途行走，或定居生活时，取水、贮水困难的问题就会凸显。早期先民受干渴之苦的窘况远非今人可以想象。陶器出现后，有了像仰韶文化尖底瓶一类的汲水器，又有了大瓮、大罐、大缸、大盆一类的贮水器，人们既可以将水或水器带在身边远足，也可以在居住地把水贮存起来以备缺水之用。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饮水问题基本解决了。由此，一定距离的社会交往、贸易、采摘、土地开垦等便可以进行。

农业生产开始后，陶器成为原始农业灌溉的必备良器。用陶器浇灌庄稼，使得种子的成活率、庄稼的产量大大提高，人们对原始农业的把控度和探索规律的能力大大增强。《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汉阴丈人抱瓮灌畦，蔽漏久而败，不足以受水也。瓮瓶皆陶器，井用瓶，谷用瓮。”这里所说“汉阴丈人抱瓮灌畦”可以从某种角度上帮助我们认识早期陶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

早期水类器皿主要有瓶、壶、觚、杯、缸、罐、瓮、盂、鬻等。



▲运城博物馆展出的夏县西阴村红陶瓶

记者 刘亚 摄

文史小考

## 寿星大脑门何来？

寿星也是由一颗星辰转化而来的，它在天文学里的名字是船底座α星，位于南半天球南纬50度左右，在中国北方地区其实很难看到。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秦朝统一天下时就开始在首都咸阳建造寿星祠，供奉寿星。

大家都知道，寿星手中有一柄手杖。《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明帝在位期间，曾主持一次祭祀寿星仪式，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宴会，与会者是清一色的古稀老人，普天之下只要年满70岁，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有资格成为汉明帝的座上客。盛宴之后，皇帝还赠送酒肉谷米和一柄做工精美的手杖。

魏晋以后，寿星的手杖产生了变化，斑鸠的王杖换成了桃木手杖，其政治教化功能逐渐被削弱。据说桃木能祛病强身，延年益寿，过去象征特权的王杖，现在成了寿星手中祛病强身的长寿吉祥物。明朝政府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沿袭的国家祭祀寿星制度。寿星被完全去除了政治色彩，从此大跨步进入民间，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世俗品格的神仙。

后来由于道教养生观念的融入，也使寿星形象发生相应的改变，最突出的要数其硕大无比的脑门儿。山西永乐宫壁画中的寿星，可能是存世最古老的寿星形象。在永乐宫上千位神仙中，我们一眼就能将其认出，就是因为其那超级的大脑门儿。

寿星的大脑门儿，也与古代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紧密相关。比如丹顶鹤的头部就高高隆起，再如寿桃是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特供的长寿仙果。传说这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食用后立刻成仙长生不老。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种长寿意象融合叠加，最终造就了寿星的大脑门儿。



▲运城工艺美术馆展出的“寿星”题材工艺品

记者 刘亚 摄

## 史海钩沉 核桃：始于观赏，盛于文玩



▲运城文商旅综合体内“东乐社”展出的文玩核桃

记者 刘亚 摄

西域核桃传入中原时，起初是作为观赏珍果。汉武帝的上林苑中，就种植胡桃多棵，是皇家赏玩的奢侈品。到了东汉末年，孔融的《与诸卿书》还说“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孔融贵为少府，朋友送胡桃给他作为礼物，他一直铭记在心，说明胡桃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据唐人《领表录异》载，毕占国种植有一种偏核桃，很多胡人收集它的果核，当作珍宝赠送给汉朝官员。《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载，汉顺帝在位时，设有胡桃宫，以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国使臣。以“胡桃”为宫殿之名，足见胡桃的珍贵。

《太平御览》还记载有一则核桃的故事：公元334年，陕西扶风县人韩约被任命为高官。他请求皇帝赐几枚核桃种子，带回故乡栽种，以便年老后在故园观赏胡桃树，以娱晚年。

到了晋代后期，核桃种植蔚然

成风，还出现了著名核桃品种。如郭义恭的《广志》中，就记载有“薄皮多肌”的陈仓核桃、“大而皮脆，急剥则碎”的阴平核桃等品种。

到了唐代，核桃种植更是普遍。如《酉阳杂俎》记述：“胡桃仁曰

虾蟆，树高丈许，春初生叶，长三寸，两两相对。三月开花，如栗花，穗苍黄色。结实如青桃，九月熟时，沤烂皮肉，取核内仁为果。北方多种之，以壳薄仁肥者为佳。”这说明距今一千多年前，北方地区已广种核桃树了。

核桃在中国人文环境中还衍生出一种特色文化——赏玩核桃。赏玩核桃又叫文玩核桃，也称手疗核桃、健身核桃，古时称“揉手核桃”。它约起源于隋代，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清代自诩“稽古右文”的乾隆帝，更是玩核桃的行家里手，他曾作诗赞曰：“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血气涌，何年是白头？”与明熹宗不同，乾隆帝年近九旬方才寿终，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帝王。

到了清末民初，文玩核桃依旧兴盛，北京就有民谣调侃道：“核桃不离手，能活八十九。超过乾隆爷，阎王叫不走。”

（《大众日报》）

寿星的大脑门儿，也与古代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紧密相关。比如丹顶鹤的头部就高高隆起，再如寿桃是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特供的长寿仙果。传说这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食用后立刻成仙长生不老。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种长寿意象融合叠加，最终造就了寿星的大脑门儿。

（《燕赵晚报》）